

论盖卡卡法庭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及其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贺 鉴

内容提要 1994 年，卢旺达有 80 万~ 100 万人丧命于旨在灭绝图西族的部族大屠杀中。冲突之后，约有 10.6 万人面临种族灭绝的指控，但审判系统却因大屠杀而被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和卢旺达政府一致认为：重建司法体系和保护人权是卢国家重建的重要条件。联合国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卢境内的种族灭绝和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为了弥补传统司法程序在处理这一人数众多案件中的不足，卢旺达启用了盖卡卡法庭。卢国际刑事法庭与盖卡卡法庭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也还存在一些缺陷。

关键词 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 种族大屠杀

作者简介 贺鉴，湘潭大学讲师、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湘潭 411105）。

* 1994 年 4 月 10 日~ 7 月的 100 天里，卢旺达约有 80 万~ 10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1/10）死于部族大屠杀中。为了恢复秩序，卢旺达政府拘押了数千自称参与屠杀的胡图人，此外，还有 10 万多人在监狱中等待审判。¹ 1994 年 11 月 8 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负责起诉同年在卢境内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者，以及在邻国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卢公民。^④ 卢旺达国内法院也开始对参与大屠杀者进行审判。但是，由于司法体系不健全和审判效率的低下，使大量囚犯只得等待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接受审判。在此情况下，卢旺达启用并创新了已沿用几个世纪的类似司法的特殊方式——盖卡卡法庭（Gacaca Tribunal）。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盖卡卡法庭在卢大屠杀案件的审判中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却也还存在各自的缺陷。

盖卡卡法庭 与卢旺达大屠杀人权案件

大屠杀期间，卢旺达的司法部门和法律职业事实上被清除了。随之建立的新政府国家机构有很少的法官和律师保留了下来。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法院的组成沿用了传统的金字塔结构，最高层次机关为最高法院（分成 5 个分院，即：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审计法院、特别法院、撤销法院），下属依次为 4 个上诉法院（30 名法官），12 个地方初审法院（161 名法官）和县法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See Luis Salas,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Post Conflict Societies: the Rwand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Fall 2002, Vol. 26, No. 2, p. 165.

^④ See Larry D. Johnso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 Vol. 67, No. 1- 2, 1996, p. 501.

(572 名法官)。到 1992 年，卢旺达律师协会有 60 名律师，是前一年的两倍。从 1994 年起，针对大约 220 人起诉，各级法官约 800 人受到雇用和训练，但许多司法官员和一部分律师都没有接受正式的法律专业教育，而仅仅受过简单（3~6 个月）的相关训练。¹ 卢旺达政府于 1996 年进行了特别立法，把大屠杀中的罪行分为 4 种类型。其中，第一类包括那些策动和贯彻大屠杀以及性虐待的犯罪（处死刑）；第二类指杀人犯（处以终生监禁）；第三类包括没有导致死亡的伤害罪（处以 7 年有期徒刑）；第四类是处理财产犯罪（处以民事赔偿）。同年，政府当局在既有的司法体系内设立了特别法院，每 10 个地区由 3 名成员组成审理小组；其成员来自于接受过 3~4 个月法律训练的 250 名地方行政官员。自该法出台以来，普通法院也用传统程序来审理大屠杀案件。但是至 2000 年 3 月也仅审完约 3 000 宗案件。^④ 如果按照这样的办案速度审理这些积压的案件将要花费 100 多年时间，且须假定在此期间不会出现任何新案件。

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显然，卢旺达既有的审判方式无法满足人权保护的要求。为了弥补传统司法程序在处理人数如此众多的案件的不足，卢旺达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便是启用沿用了数个世纪的类似司法的特别程序——盖卡卡。它在卢旺达已有几百年历史，在传统上一直被用于解决争议和涉及偷牛罪的案件，它似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解决争端机制而非刑事审判程序。与许多习惯法审判一样，盖卡卡的最初目的就是通过将内部冲突事件提交给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的非正式会议裁决并使双方和解，从而使社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推定是谁的过错并不是盖卡卡审判的中心内容，因为它的目的并非裁定谁有罪，谁清白，而是为了制止冲突并最终促进社区的团结。这种审判仅限于处理小的纠纷，而非常严重的争端则要交由部族首领来裁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盖卡卡并无权审理卢旺达大屠杀的相关案件，但此后成立的盖卡卡法庭则被正式授权。

卢旺达政府启动盖卡卡法庭审判程序后，把第三类和第四类，甚至第二类罪行交由 9 000~1 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这些法庭由部族的长者

和社区德高望重者组成，他们有权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因为审判程序的内在特点以及律师的缺乏，这项举措并没有排斥律师的参加。由年满 18 岁的公民组成的小区大会（Cell Assemblies）选出 25 万名法官为盖卡卡法庭服务。首先，小区盖卡卡法庭（Cell Level Gacaca）选出 24 名正直的人，其中 5 人将成为掌握法庭管辖权的代表。小区盖卡卡法庭拥有对第四类犯罪的审判权（财产犯罪和轻微犯罪）。而且，小区大会可以区别出被告从而做出合适的判决。第三类犯罪的审判权归分区盖卡卡法庭（Sector Level Gacaca）。同时，分区盖卡卡法庭也会受理来自小区盖卡卡法庭的上诉。社区盖卡卡法庭（Communal Gacaca）的法官将判决第二类犯罪，并接受来自分区盖卡卡法庭的上诉，地区盖卡卡法庭（Prefecture Gacaca）拥有对来自社区盖卡卡法庭的上诉的最终裁决权。^④ 第一类犯罪的审判权归于普通法院。

如果罪犯坦白的話，他们将获得大幅度减刑，并有可能通过社区服务的形式来服刑。比如说，第二类犯人如果坦白的話，他们 25 年的人身监禁将会减到 7~12 年，其中不超过一半的时间会在监狱里度过，而剩下的时间将以社区服务的形式度过。同样，第三类犯人如果坦白的話，其刑期将减少一半，只有 3~5 年，且是以社区服务的形式来服刑。14 岁以下的少年犯不由盖卡卡法庭审判，而是移交给再教育中心。14~18 岁的少年犯不论他们是否坦白自己的罪行，都获得减刑。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大量犯人将从事社区服务，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刑期要以此方式执行。而且自 1994 年便被监禁在拘留所的人也会获释。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与卢大屠杀人权案件

为了维护国际人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¹ See Luis Salas, *op. cit.*, p. 181.

^④ See Luis Salas, *op. cit.*, p. 182.

^{④④} 卢旺达的 12 个地区被分为若干社区，社区下分 1 531 个分区，分区下约有 9 000 个小区。

七章¹ 的规定和安理会第 995 号决议, 国际社会于 1994 年 11 月 8 日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设立此法庭, 除了因为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未能及时有效地阻止卢旺达大屠杀, 使人权遭受大规模侵害而感到内疚以外, 也缘于卢旺达政府的请求。

1994 年, 卢旺达政府提出在卢国内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国际特别法庭来审判被指控种族灭绝者。同时, 安理会还批准了该国际法庭的规约和审判机制。该规约共 32 条, 其中规定, 该国际法庭有权起诉 1994 年在卢境内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者, 以及在卢旺达的邻国犯有上述罪行的卢公民。^④ 该国际法庭管辖的罪行有 3 种: 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 (反人类罪)^⑤ 和违反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诸公约第三条和 1977 年 6 月 8 日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罪行 (第二~ 第四条)。^{1/4}

法庭之所以适用附加议定书的规定, 是因为议定书不属于“习惯法部分的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因此, 联合国秘书长在提交的卢旺达法庭规约报告中指出, 安理会“已决定采取比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采纳的规定更广泛的方法选择适用的法律。进一步讲, ……报告指出, 国际审判机构不考虑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内容是否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 或者是否被认定为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1/2} 卢旺达专家委员会指出, 虽然卢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 “已经被全球广泛认可的《日内瓦公约》第三条规定已成为约束非公约缔约国的国际习惯法部分, 并同样非常合乎情理地获得绝对法的地位”^{1/4}。根据该规约, 国际法庭对自然人具有管辖权; 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该国际法庭位于坦桑尼亚阿鲁沙, 由一个上诉庭、两个审判庭、检察处和书记处组成。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共同拥有同一个上诉法庭和首席检察官。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设在海牙,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设有副检察官办公室。法庭有 11 名独立的、不同国籍的法官。5 名法官组成上诉庭, 各 3 名法官组成两个审判庭。审判庭的 6 名法官由联合国大会从安理会提出的一份法官候选人名单中选举产生。法官任期 4 年, 得连选连任。

卢旺达境内武装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卢国际刑事法庭与卢国内法院对冲突中的危害人类罪行都具有管辖权, 但是由于两个法庭在刑罚适用上不尽一致, 卢国内法院适用死刑的规定, 故卢政府希望卢国际刑事法庭也适用死刑。安理会在前南斯拉夫法庭建立过程中已经明确反对适用死刑, 因此,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没有死刑的规定。此外, 卢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仍是该法庭与卢政府之间争议的首要问题。在卢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前向联合国呈交的有关文件中, 卢政府希望国际特别法庭的审判权包括对在 1994 年 4~ 7 月间关于种族灭绝方面所犯的罪行而不包括新政府建立后因犯罪而起诉的案件。尽管在表决时卢旺达驻安理会代表投了否决票, 但安理会投票表决的结果却是同意授予卢国际刑事法庭对 1994 年中所犯的罪均有审判权。根据规约的有关规定, 尽管卢国际刑事法庭和卢国内法院对大屠杀的相关案件都有管辖权, 但卢国际刑事法庭具有优先权,

¹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 “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 共 13 条 (第 39~ 51 条), 具体参见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注释》,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81~ 365 页。

^④ 具体情况参见卢旺达刑庭网址: <http://www.ictr.org/wwwroot/english/geninfo/structure.htm>

^⑤ 关于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具体条款, 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56~ 257 页。

^{1/4}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三条规定, 在缔约国领土内发生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场合, 冲突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 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 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 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 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 或才力, 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因此, 对于上述人员, 不论何时何地, 不得有下列行为: (1) 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 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2) 作为人质; (3) 损害个人尊严, 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4) 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的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的法庭之宣判, 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2. 伤者、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公正的人道主义团体,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得向冲突各方提供服务。冲突各方应进而努力, 以特别协定方式, 使本公约的其他规定得全部或部分发生效力。上述规定的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的法律地位。而《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主要内容是保护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

^{1/2} Lany D. JOHNSO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 Vol. 67, No 1- 2, 1996.

^{1/4} 绝对法, 是指在国际法之外, 存有一项不能违反的“最高规范”。Larry D. JOHNSON, op. cit.

并且能够请求卢旺达的任何法院放弃所受理的案子。巴盖索拉上校 (Colonel Bagasora) 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许多被监禁或被指控者申请到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受审, 而不希望在国内法院受审, 因为国内审判的刑罚较国际法庭可能更重。¹ 这样无形中加大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量。

截至 2001 年底,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 70 多名嫌犯, 其中 50 人被逮捕归案, 完成了 9 例审判, 其中 8 人被判有罪, 1 人无罪开释。大屠杀发生时的卢旺达政府内阁成员有 2/3 被法庭收押, 还有一些当时的高级军官也被监禁。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自成立以来, 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判: 卢前总理让·坎班达 (Jean Kambanda) 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前政府首脑; 卢旺达刑庭是第一个判定种族灭绝罪行的法庭; 也是第一个判定系统地使用强奸构成种族灭绝罪的法庭, 这一判决后来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采纳。^④

盖卡卡法庭和卢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盖卡卡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于审理卢旺达大屠杀的相关案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较有效地推动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但是, 不可否认, 它们也都还存在一些弊端, 从而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使它们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大屠杀结束后, 联合国和卢旺达政府一致认为: 重建司法体系与保护人权是重新建立卢国家的最重要的条件。而重建卢旺达司法体系的任务之艰巨令人吃惊, 难以想象。卢政府意识到: 要想用传统的审判程序彻底解决种族灭绝案件是不可能的, 联合国领导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也是杯水车薪。种族灭绝冲突之后的 7 年里, 约有 10.6 万人面临种族灭绝的指控, 其中有的自 1994 年便已呆在拘留中心了, 而审判系统却因大屠杀而被严重削弱。而对如此大规模地侵害人权的案件,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相同的经验可借鉴, 没有任何一个审判系统曾经面临 10 万多人待审的局面。在此情况下, 盖卡卡

法庭的启用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9 000 多个盖卡卡法庭有权审理第三类、第四类, 甚至是第二类的犯罪, 这就大大减轻了卢旺达普通法院和特别法院的审判压力, 使它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审理第一类犯罪。盖卡卡法庭不仅能广泛地审理相关案件, 使严重侵犯人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能使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受惩后重新融入地方社会生活来达到部族和解, 并且通过和解为国家的统一和部族团结做出贡献。两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反映了人们对于盖卡卡法庭的看法和了解状况。两项调查结果均显示卢旺达人民希望盖卡卡法庭有助于和平与团结, 绝大多数市民都准备参加到盖卡卡法庭程序中并发挥作用 (在一项调查中占 93%, 另一项中占 96%)。在最近一项调查中, 被调查者大多数认可盖卡卡法庭程序及其审判的进度。可以肯定, 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者是最关注盖卡卡法庭的。

诚然, 在盖卡卡法庭审理案件中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程序正当问题, 并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 但目前看来它却是卢旺达国家审判机构用以摆脱其审判困境的最有效方式。虽然盖卡卡法庭有的地方明显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审判程序标准, 然而, 让成千上万的人留在监狱里遥遥无期地等待审判系统重建后的审理, 似乎更令人无法接受。

国际社会在卢旺达法庭成立之前设立的一些调查和起诉机构, 大都出于抚慰公众强烈反映的需要。尽管公众强烈要求对武装冲突期间的暴行予以法律制裁, 但是调查和审判机构也只是针对一些国际冲突采取措施, 而国内冲突无论如何残暴却很少引起世界主要国家的关注, 特别是对建立国际机构具有迫切政治愿望的国家。卢旺达法庭是惟一被授权起诉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庭, 虽然到目前为止法庭的工作尚未取得显

¹ See Larry D. JOHNSON, op. cit. M. Cherif Bassiouni: "From Versailles to Rwanda in Seventy-Five Years: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ume Ten, Spring 1997.

^④ 参见魏宗雷、邱桂荣、孙茹著:《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 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01~102 页。

著成效, 但它在突破国际性冲突范围的束缚方面却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¹ 推动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人权保护中至少有以下功绩:

1. 法律渊源上的进展。该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 因而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④

2. 拓展了国际法原则。该国际法庭在纽伦堡法庭、远东法庭、以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将只由冲突的某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发展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受冲突某一方的限制,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之一的, 无论其为冲突哪方, 均应承担刑事责任。

3. 进一步糅合了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 并丰富了国际人权法的相关理论。国际法庭在诉讼活动中合理使用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

当然,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还存在一些缺陷。例如, 该国际法庭设在阿鲁沙, 路途遥远, 护送证人出庭非常困难。事实上, 由于旅费昂贵, 大多数卢旺达人没有机会能够看到或听到在离他们非常遥远的地方所进行的审判, 因而该法庭无法成为受害者疗伤的工具。又如,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两个法庭

规约对“反人道罪”内涵的解释不尽相同,^(四) 却共同拥有同一个首席检察官和上诉法庭。这为法庭的实际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例如, 一个检察官穿梭于不同地理位置, 以及适用不同法律解释的两个法庭之间进行诉讼活动, 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协调现象势必影响检察官和法庭的诉讼质量。此外,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自始就受到一些因素的困扰, 如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腐败丑闻、机构内部斗争、西方检察官和非洲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矛盾和种族关系紧张等。^{1/4} 但不管怎样,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维护国际人权方面的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 它推动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赵 苹)

¹ 参见赵秉志主编:《国际区际刑法问题探索》,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21 页。

^④ 以决议创制的法庭比以条约形式创造的法庭其优点突出了及时性和有效性, 而以条约形式建立的法庭其缺陷表现为将花费大量的时间拟订文书, 并需获得法定数目的国家批准方能生效, 即便如此, 也不能保证应成为条约缔约国国家的批准, 以确保条约的切实有效性。参见赵秉志主编: 前引书, 第 421 页。

^(四) 由于两个法庭规约的背景不同, 因而两个规约描述的构成违反人道罪行的行为亦不相同。依照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的规定, 以下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人道的, 即“在武装冲突中实施的, 无论是国际性质的, 还是国内性质的直接针对平民的犯罪行为”(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第五条); 而在卢旺达规约中违反人道的罪行则被认为, 是“出于民族、政治、种族、肤色、宗教原因, 部分实施了广泛或系统的袭击平民的犯罪行为”(卢旺达法庭规约第三条)。

^{1/4} See Marlie Simons, “Trial Examines War Crimes, Free Speech and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5, 2002.